

● 胡 寄 窗

评《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

最近获得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的《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一书(以下简称《研究》),是朱钟棣副教授的一部内容独特新颖并具有高质量的学术专著。这部专著最值得称述之处就在于它的内容之独特新颖。我说它独特新颖不是指《研究》的著者新创了什么突出的观点,而是指他把数十年来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重要经济学说,如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形,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和最低生活费工资率,以及再生产、经济危机和资本积累等基本理论所提出的反对、维护、调和或另创新说的观点作了扼要系统的综述。我国大多数经济理论工作者一向是在苏联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经济观点的框架下培养起来的,以往对第二国际学者的观点尚斥为修正主义不敢接触,哪里想得到还有各式各样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观点之出现,更想不到这种观点还出乎意料之多。仅就《研究》的第二章“劳动价值论”部分来说,西方学者就曾提出不少责难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意见,如复杂劳动能否还原为简单劳动以及还原的“倍加”系数如何确切计量;在可选用几种生产方法时单位产品价值量就难于决定;联合生产可能出现负价值乃至负剩余价值;固定资本折旧的存量计算法不合理;认为马克思对价值定义不一致;不同意以劳动为价值的唯一源泉等等。对于一向墨守成规、教条式地理解劳动价值论的人们来说,这些意见之出现确是意料所不及。《研究》对这些反对意见的每一种,均汇集了一些为劳动价值论辩护的观点、调和论调或另立的新说。不论这许多正反方面的意见是否有可取之处,至少使人们在阅读后耳目为之一新。

《研究》的著者一向从事于《资本论》的教学研究工作,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有扎实的基础,1987年又曾赴英国剑桥大学晋修一年。英国剑桥这所大学虽是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的大本营,但自本世纪20年代中期起即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莫里斯·多布、皮罗·斯拉法等在那里终身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近年来已成为世界闻名的青年激进经济学派的中心。因此,《研究》的著者在留学剑桥的

一年中才能有充分的机缘结识一些英国及各国有名学者,探讨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问题,大大地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当然著者在国外时间所收集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应是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决不是不分良莠地收集。既然对所研究的学术领域已能从世界范围掌握其概况,而所收集的大量资料又是第一手的和具有代表性的,再加著者对马克思经济学说又具有较深厚的功底,故《研究》必然是此领域内的高质量学术专著。

二次大战后尤其是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兴趣日益浓厚。这主要由于国际经济随着科技之飞速发展也产生急剧变化,不仅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西方学者力求结合现实进一步发展其经济理论,连一些开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试图从马克思经济学说中学到一些东西。因此,尽管原苏联、东欧曾发生动荡,马克思经济学说却决不会过时,但要保持其活跃的生命力必须有所改进、发展以适应客观现实。既要改进和发展马克思经济理论,首先就要突破教条、解放思想,放胆地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吸取其足资借鉴的合理因素。有些西方学者近数十年对马克思经济理论之研究,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比我们先走了一步,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先行思想资料。当然这些资料中很大一部分是不足取甚至是错误的,但也有不少是颇资参考的,既可节省我们从头探索的许多精力,也可使我们避免走一些弯路。《研究》在其“前言”中曾经指出:“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是一个时空跨度极大的课题,已刊行的论著也是车载斗量,难于用一部20余万言的专著穷尽其研究的全貌”。事实的确如此。但《研究》对这一迫切需要探讨的课题,能进行系统的评述,这无论在理论或实际上均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与作用。

这里,我想提一点建议。由于《研究》中所说的“西方学者”是泛指除原苏联、东欧之外的激进学派和西方正统经济学家,并将日本学者也包括在内,因此再版时如能采用“国外学者”来代替“西方学者”一词,便可省去“西”与“东”的矛盾。